

“夹击”“解救”两皆无

——对《晚晴集》中所述“闽西起义”问题的考证

福建省龙岩市闽粤赣边老同志联谊会 编印

二〇〇三年五月

编者的话

1949年春夏之交,我解放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渡长江,挥师南下。闽粤边国民党军政当局,眼看大势已去,为了寻找出路,纷纷酝酿反蒋起义,弃暗投明。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我闽粤赣边区党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改称华南分局)的指示,一方面加强军事攻势,一方面发动强大政治攻势,策动敌军起义。当时,粤东、闽西乃至闽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都是由我党我军策动而取得成功的。

对于这段历史,凡我闽粤赣边广大干部战士,均认为边区党委和边纵执行中央指示坚决有力,卓有成效。

可是,不久前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由原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办公室主任胡冠中同志所著《晚晴集》一书,在其亲友篇《张圣才传奇》一文中,

却说闽粤赣边区我党我军领导人不了解闽西李汉冲等人率部起义的义举,致使起义部队在受到国民党第九军的进攻时,又遭到我边纵堵击,一时陷入两面夹击的危难之中,后由李汉冲持张圣才的介绍信赶赴香港,危难才得以解救(见附件一)。这在闽西革命历史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原《闽西日报》主任记者李来鉴同志在阅读该书时,发现这一节所述,过去从未听说过,于是搜集有关闽西文史,地方志资料等进行查对。发现胡冠中所写与事实有很大出入,于是写了《值得考证的史料》一文,并寄给胡冠中同志,胡接到李这份材料后,即复信给李来鉴同志(见附件二),信中称赞李对历史是认真对待的,认真查了有关材料,这种精神很可贵。但又说,“张老(指张圣才)在回忆中有差错是可能的(比如时间、地点),但主要的东西应该不错”。“确实不好轻易否定”,希望李来鉴再多方找资料考证。

为此,李来鉴同志走访了当年知情的老同志并查阅历史档案资料,进一步认真考证,去伪存真,澄清历史。先后又写了《见证历史忆当年》和《当年档案如此说》两篇考证文章。

胡冠中同志离休前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在游击区,又主要从事过我党电台工作,对1949年我闽粤赣边区党委策动和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应有所了

解。而在其《晚晴集》出版之前,《中共福建地方史》、《中共闽粤赣边区史》、《闽粤赣边纵队史》以及《闽西人民革命史》早已先后出版。对闽西起义的全过程,上述党史、军史都有具体叙述。胡冠中同志在撰写《张圣才传奇》时,对“解救起义军于危难中”一节,竟未有考虑要进行查对,或向有关老同志咨询,却完全相信张圣才先生个人所述。同时,也无考虑将其写进书中并公开出版发行,将造成不良影响,实属遗憾。

历史真实重千钧。为了维护历史真实,也为了让我们子孙后代正确了解建国前夕,闽西国民党军政人员是如何起义的这段历史,避免以讹传讹,我们将李来鉴同志所写三篇考证文章选其两篇,连同陈鸣、罗天同志的回忆,编印成册,供同志们阅读。

李来鉴同志对《张圣才传奇》中所述闽西起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考证。这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难能可贵,很值得我们学习。

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五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见证历史忆当年

——访谢毕真同志纪要 李来鉴(1)

绝无边纵“堵截”起义军之事 (1)

谢毕真邱锦才的回忆 (3)

我党在香港的领导机构和变动情况 (8)

党史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9)

当年档案如此说

——有关“闽西起义”问题的考证 李来鉴(11)

胡冠中同志的三点意见 (11)

历史档案这么说 (13)

起义军没有“发起攻击”第九军 (17)

接送吴德贤先生的一点回忆 陈 鸣(21)

与起义人员接触的片断回忆 罗 天(23)

附录一：解救起义军于危难中 (25)

附录二：胡冠中同志给李来鉴同志的信 (28)

见证历史忆当年

——访谢毕真同志纪要

李来鉴

绝无边纵“堵截”起义军之事

笔者把《值得考证的史料》寄送给谢毕真同志后，为了考证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以下简称“边纵”）1949年是否“堵截”过闽西起义军，使闽西起义军一边受国民党军、一边受边纵“两面夹击”的史实，于2003年4月6日、8日、11日，在谢毕真同志龙岩市西安南路的住所访问了他。

谢毕真同志是老红军，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的离休老领导。建国前和建国初期，曾分别担任中共广东梅州地委宣传部长兼地委机关报《人民报》社长，中共闽

西地委(龙岩地委)宣传部长兼地委机关报《新闻西报》社长。离休前夕,1982年10月,开始担任闽粤赣边区党史编审领导小组副组长,并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顾问小组成员,从事闽粤赣边区党史编纂工作多年。

谢毕真同志在接受笔者访问时说,胡冠中同志也曾于2002年初冬寄过一本《晚晴集》给我。你所写的《值得考证的史料》我认真看了,你文中所引张圣才先生曾“解救闽西起义军于危难中”的讲述,都是摘自《晚晴集》中的《张圣才传奇》一文。你对此事提出疑问,找资料进行考证,这对维护史料真实,避免以讹传讹,是很重要的。谢毕真同志说,1949年5月,梅州和闽西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都是由我党策动的。

谢毕真同志说,1993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福建地方史》,1999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闽粤赣边区史》,对“策动闽西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一节均有具体的叙述,书中提到起义前的1949年3月份,根据中央香港分局指示,边纵司令员刘永生、政委魏金水联名致信李汉冲。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又给闽西地委下达指示,要求地委加强政治斗争,争取瓦解和孤立敌人。谢毕真同志还取出199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闽粤赣边纵队史》说,这本书的199—202页,对“闽西起义”一节,开头即写到“边区党

委和边纵对策动闽西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也做了大量工作。”因此,说刘永生司令员、魏金水政委及边纵“不了解李汉冲等人率部起义的义举”,是有违历史事实的,更绝对没有发生什么边纵“堵截”闽西起义军的事。

谢毕真邱锦才的回忆

谢毕真同志回忆说,1949年4月,闽西地方实力派傅柏翠,派代表郭南熏前来广东梅县松源,同梅州地委洽谈闽西起义的问题。正洽谈间,梅州地委电台传来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的特大喜讯。地委机关报《人民报》连夜赶印“号外”。郭南熏呆不住了,次日即带着《人民报》“号外”,急冲冲赶回福建上杭向傅柏翠(傅的老家在上杭县蛟洋)汇报。1949年5月初,武平县象洞工作团介绍地下党员练明灿到梅县松源迳口梅州地委机关,找到我和地委副书记陈仲平同志,带来国民党武平县县长练平的紧急口信,要陈仲平或我近日与他会晤。地委研究后,决定由我回去。我、陈仲平和练平都是武平县象洞乡人。练平1927年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共武平县委书记

记、共青团福州市委书记，1934年在福州被捕变节，多年来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先后担任过上杭、宁化、龙岩、武平等县县长。我与练平为起义问题，接触过好几次了，这次我回到家乡，与我党象洞工作团主任谢启发在洋贝村会见了练平。练平通报说：日前，傅柏翠、李汉冲（原任闽西专员）、练惕生（新任闽西专员）召集了上杭、武平、永定、连城、龙岩各县县长在上杭郭车开了秘密会议，权衡当前形势，决定宣布反蒋起义，接受共产党领导，并商定由李汉冲赴香港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汇报请示，练惕生则到福州向省政府领枪，他们同时派出代表分别向中共闽西地委和闽粤赣边区党委汇报，派练平与中共梅州地委联络。我向练平谈了大军渡江后的形势，指出傅、练、李等起义是明智之举，对革命和闽西人民都是有利的，我表示立即向地委和边区党委汇报。

1949年5月22日、23日，当时广东梅县已解放，我们已进驻梅县县城，接到了闽西傅柏翠、练惕生、李汉冲在上杭县城发动反蒋起义的通电，他们还致电梅州地委，要求陈仲平和我到上杭联系，商谈有关问题。陈仲平由于梅县人民政府刚成立，他担任了县长，工作走不开，边区党委组织部长王维与地委研究后，决定由我赴上杭。王维指示，此行任务有三：一、向起义人员宣传形势和我们的“约法八章”，代表梅州地委向

他们表示慰问和致意；二、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问题；三、请闽西开放粮禁，支援梅县 500 石大米，以缓和梅县严重的粮荒。我稍作准备，并从已报到的梅州公学学员中挑选了十名知识青年组成临时文工团跟我同往。我们经过武平县岩前镇，再到象洞乡，练平已在那里等我们，我和练平、谢启发再步行 50 华里，到达上杭县城。安顿住下后，我们到设在县参议会的“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闽西起义成立的指挥机构，傅柏翠为主任，练惕生、李汉冲[当时李去了香港]为副主任，练平为秘书长），练平逐一介绍其主要负责人跟我见面。我对傅柏翠他们说，你们的起义通电我们已收到，你们这次与李汉冲先生领导闽西起义，实是审时度势的明智行动，是对革命、对闽西家乡人民的一大贡献，我代表梅州地委前来看望你们，对你们的义举表示欢迎。傅柏翠握着我的手说：“这次起义，不求有功，但求赎罪，我是有罪之人，希望边区党委和边纵早日来接管，好让我早日回家钓鱼。”大家坐下后，我首先谈了当前政治形势与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布《约法八章》的内容，强调了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简要介绍了梅州地区解放情况。接着，练惕生介绍了起义经过，说当前有不少问题要请示区党委解决。我说问题可以反映，建议他们早日派代表向边区党委和闽西地委请示。练平说，他们准

备派代表到广东大埔向边纵魏金水政委报告。关于我提出支援梅县粮食问题,练惕生说:“我们同意闽粮出口支援梅县,将通知基层放行。”据此,当天下午我便向梅州地委发回电报,请立即通知梅县商人来闽购运粮食。

我到上杭县城的第二天,练平到我们住处转告傅柏翠、练惕生意见,要求开个座谈会,以便将情况、问题、意见及时向上反映。闽西地委和第七支队(即闽西支队)也很快派出代表罗天和李白克两同志从上杭白沙赶来参加。座谈会在县参议会召开,由练惕生主持。座谈会开始前,我向罗天说,我们这次主要是听听傅柏翠、练惕生先生的意见,以便带回去向各自的地委汇报,并上报边区党委。座谈会上谈到的问题,主要有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和机构问题,会后行动方向问题,接管问题,我党各地工作团活动的安全问题,税收问题,等等。我和罗天说,这些问题都牵涉到原则性、方向性的问题,要由边区党委来与你们磋商决定。练惕生说,临时行动委员会已决定派吴德贤近日起程到广东大埔向边区党委和边纵请示。在上杭活动期间,我还接受了我党地下工作小组的情况汇报,我对上杭工作小组的工作作了具体安排,要他们在城内还不要公开暴露,继续与武平象洞工作团联系。通过工作组的推荐,我吸收了十多位知识青年到

梅州公学学习。

谢毕真同志说,我上面所讲的经历,加上傅柒生撰写的《军旗猎猎号声隆——1949年闽西起义纪略》中列举的事例,说明边区党委和边纵是闽西起义的策动者、接纳者,怎么能说边纵“不了解李汉冲等人率部起义的义举”呢?又何来边纵“堵截”闽西起义军呢?既然无发生“堵截”闽西起义军的事,张圣才先生讲述的他写信到香港“解救闽西起义军于危难中”的事,也就不成立了。

说到这里时,谢毕真同志还说,前天,我去看邱锦才同志时,也与他谈起了此事,让他看了所谓张圣才先生“解救起义军于危难中”的材料。他看后听后感到很奇怪,他说:“当年魏老(即魏金水同志)亲自交带我,要我与起义部队加强联系。经过边纵批准,1949年6月3日,在永定县湖雷成立了闽粤赣边纵闽西南联合司令部,任命我为司令员,我党在闽西的第七支队、在闽南的第八支队以及闽西起义军统一归辖我这司令部,还增补了练惕生为副司令员。说魏金水、刘永生不了解闽西起义事,说我们边纵去堵截起义军,这完全是没有的事。”邱锦才还加重语气说:“历史是不能编造和乱写的呀!”

我党在香港的领导机构和变动情况

对于我党在香港的领导机构名称及其负责人,谢毕真同志说,《中共闽粤赣边区史》第 638 页上有个注释:“1947 年 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并确定了分局的领导人选。5 月 6 日,中央对分局组织机构作了调整,方方为书记,尹林平为副书记,章汉夫、梁广、潘汉年、夏衍、连贯为委员,后增加饶彰风为秘书长。香港分局先是直属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局领导,后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管辖广东、广西两省和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等省部分地区及香港、澳门等地党组织。”1949 年 4 月,香港分局经中央批准改为华南分局,领导人不变。5 月,华南分局内迁,6 月 28 日,方方到达梅县,8 月下旬,刘永生亲率部队护送方方到赣州,9 月赣州会议后,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成立,叶剑英任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

谢毕真同志说,《张圣才传奇》一文中,对我党设驻在香港的领导机构名称及负责人均与事实不符。闽西起义后华南分局已内迁到潮梅,方方已不在香港了。

党史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值得考证的史料》是笔者于2003年2月25日写成的,电脑打字复印后,于3月2日先寄了一份到厦门给胡冠中同志。胡冠中同志看后,于3月6日写了封回信给笔者,并附寄了一本张圣才先生于1988年5月4日应民革福建省委会之约所写的《1946—1949,我的革命地下活动》(打字油印件)。在访问谢毕真同志时,笔者将胡冠中同志的信及张圣才先生的《我的革命地下活动》交给谢毕真同志看。谢毕真同志看后说,胡冠中同志在信中提到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说党史资料必须立准立好,要反复研究,去伪存真,才能搞得比较准确,这个说法是很对的。可他信中又说了“张老(指张圣才)在回忆中有差错是可能的(比如时间、地点),但主要的东西应该不错。”这就说得不对了。说张圣才“解救起义军于危难中”,说边纵“堵截”起义军,说魏金水、刘永生不了解李汉冲他们的义举,这些都是主要的东西,而这些主要的东西明显是错的。笔者听后说,经考证,闽西起义的时间是1949年5月22日,有通电起义的电文为证,而“张文”却说是

1949年5月25日；闽西起义的地点是上杭县城，而不是“张文”所说的龙岩。笔者说，胡冠中同志在信中也说了，对“张文”所述，“没有一一去考证”，“赞成把你的文章（指笔者所写考证文章《值得考证的史料》——笔者注）拿去发表，让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去研究历史”，“任何人都得服从真理，坚持对的，修正错的。”这也是胡冠中同志襟怀坦白的态度。

访问、整理人：李来鉴

2003年4月11日

当年档案如此说

——有关“闽西起义”问题的考证

李来鉴

胡冠中同志的三点意见

笔者写好《见证历史忆当年——访谢毕真同志纪要》以后，4月16日寄了一份电脑打字复印件到厦门给胡冠中同志。胡看后，分别于18日、19日给笔者家打了三次电话（一次笔者不在，是家人接的）。在19日的来电中，他集中谈了三点意见，并嘱我把要点记记：

一、张圣才先生地下革命活动的事，不但是接受过我胡冠中的采访、跟我说过，给省里的作家陈中说过，陈中据此在张近百岁时（约2001年年底），公开出

版了《守望百年》一书。张的《1946—1949,我的革命地下活动》更是应民革福建省委会之约,向组织上交的。因此,我们不要轻易去否定它。张圣才一生坎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抓他入狱三次。他因接受潘汉年领导搞地下工作,1955年5月28日起又被我省公安厅逮捕审查了三年又三个月,无罪释放后,流放山区劳动,直到1975年12月才落实政策、恢复自由。他上交民革组织上的材料,是经过长期回忆、梳理,才整理出来的。在建国前,他策反过好多起起义的事,多一起少一起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位什么苦都尝过的老人,何必还要去编造呢?(笔者在电话中对胡冠中同志说,访问谢毕真同志时,谢说他不认识也不了解张圣才先生,他不了解张先生的有关活动,他只对你所写的《张圣才传奇》当中,说魏金水、刘永生“不知道李汉冲他们率部起义的义举”、说边纵“堵截”了闽西起义军,认为这些都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二、胡冠中同志说,从你写的两篇文章(指《值得考证的史料》、《见证历史忆当年——访谢毕真同志纪要》)看,你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你不但收集有关书籍、文章对历史事件进行考证,还找到了象谢老(谢毕真)等还健在的老同志进行访问、考证。不过,还有一方面的材料值得你去了解,即当年当事人的档案材料,特别是傅柏翠、练惕生、李汉冲本人写的或亲述经其本人看过的材料,他们应该留下了这方